

四川彝族人民的解放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调查组编

1964·5·

前 言

四川彝族人民的解放（资料汇编），是我组在1958年10月到1959年8月调查的原始资料。

这份材料反映的是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在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彝族人民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以及解放时彝族人民协助解放军消灭胡宗南匪军与彝族人民欢迎解放军等情况。

这份材料由于调查的时间较短，既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现整理付印，以供参攷。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3年12月

四川彝族人民的解放

(資料汇编)

目 錄

一、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及保游支队和金江支队的情况

1、冕宁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保游支队活动情况

2、会理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金江支队活动情况

二、凉山、西昌地区的解放和肃清残余匪特问题

1、凉山地区的解放和肃清残余匪特问题

2、关于解放军东进支队向金阳耿堡地区进军的情况

3、越西县塔普尔村彝族人民协助解放军消灭胡宗南匪军的英雄事迹

4、喜德县彝族人民协助解放军消灭胡宗南匪军的情况和喜德、越西等地彝族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情况

5、西昌战役

彝族人民的解放

一、解放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及保游支队和金江支队的情况

1. 冕宁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1947年到1949年间，党派了黄觉庵、王月生等同志在冕宁负责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彝汉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当时的同志有李祥云、邓鸣鸿、严白通、廖志达、严载恒、赵相一、卢宗林、瓦渣木基和罗志清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党采取了打进国民党反动政府去做革命工作的办法。李祥云同志任冕中校长，严白通任复兴乡乡长，廖志达同志任石龙乡乡长，卢宗林同志和严载恒同志都任过复兴乡乡长，罗志清在地主军阀邓德亮那里任彝兵团团长。伪冕宁县参议会和伪县政府的财政大权都被地下党所控制了。地下党积极领导了彝汉人民反对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8年10月，军阀邓德华因残害彝汉劳动人民，吊打后山乡彝汉群众，党立即领导当地彝汉人民将邓德华监禁在冕宁，狠狠地打击匪军。1949年2月，因国民党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孙子和邓得亮的武装衝突。党决定利用军阀矛盾，发展革命的力。罗志清（彝兵团长），根据党的指示便向邓德亮说：“你要和孙子文打仗，要训练出一批人才才行。”邓为了他的利益，很赞成罗的意见，只怕没人帮他训练。于是党就派了王月生同志用军阀名义，在后山乡举办了革命的训练班，输送了大批党员和彝汉劳动人民去学习，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扩大革命的武装。到1949年底，革命的力更加发展了。冕宁城区、石龙、复兴、后山、松林、泸沽、红毛、森荣、哈哈等地区的彝汉人民已基本组织起来，掌握了三千多支枪。到了快解放时，国民党残匪纷纷向西昌逃窜，党决定领导彝汉人民消灭国民党残匪，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党号召党员和广大

彝汉群众武装起来，组成了三支“保游支队”：一支在冕宁城西哈哈一带，由伍文才同志（现冕宁县委副书记）负责；一支在森荣一带，由瓦渣木基同志（现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负责；一支在松林、泸沽、后山、红毛地区，由罗志清负责。同时党向广大彝族群众说：“你们看见头戴五星帽的就是人民解放军——从前长征经过我们这里的红军，他们叫你们做咪，你们就做咪；凡是帽子上没有五星的军队，就是国民党匪军，一定想办法消灭掉，千万不要让他们逃掉。”当伪靖边部队邓海祥的匪军送武器到富林去堵截解放军，残匪羊仁安、谟光殿、尹昌衡逃经泸沽时，两次我们都准备率领冕宁一带的彝汉人民消灭他们，但因当时匪军数量较多，我们又不知道解放军进军离我们还有多远，如果接应不上，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彝汉群众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因此，党指示我们暂不动手。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很想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动员冕宁的彝汉人民武装，集中到西昌附近的小庙一带，扼守机场，把胡贺（按指胡宗南、贺国光）匪帮一网打尽。但因想了许多办法都没有联系上，我们才迟了一步，胡贺匪首就乘飞机逃跑了。当时宁南一带的彝汉人民武装“金江支队”，在党领导下配合解放军歼灭残匪，向北进军。国民党匪军祝师长和伪靖边部邓海祥即率匪军前去堵截，因为罗志清是伪靖边部彝兵团长，行从他们一定要他同去。当时罗志清想：“打自己人，我才不干哩！”向党请示后，党认为：“罗同他们去，给敌人来个前后夹攻，有何不好。”匪军刚到宁南，因二野从云南入川，就纷纷逃回西昌附近。接着就向喜德逃窜。因而配合金江支队消灭胡匪的任务没有实现，罗志清就领着彝兵团回到泸沽。这时一野从成都沿川滇公路南下，便同一、二野战军在泸沽接了头后，就配合着解放军消灭胡匪军。好不容易才盼望着解放军来，彝汉武装和广大人民非常欢喜。从冕宁、泸沽到喜德一路，广大彝族人民都来欢迎，赶羊、牵牛、送柴、背水、运粮来欢迎解放军的人接连不断。

並爭先恐后为解放軍帶路，一直把解放軍帶到胡匪逃竄的地方——冕山一帶。由于一二野战軍兩路合围，匪軍走头无路，他们逃竄到冕山后，到处挨打，寸步难行，再加上解放軍已经赶到，匪軍被迫退到喜得的結尾沟去躲艾，彝族人民看見他们帽上没有五星，除用武器消灭他们外，就徒手去繳获匪軍武器，把七百多匪軍官兵衣服脱下，剥得精光。大家一致認為：解放軍到了，我們有了靠山了，出气的日子到了。兩大野战軍在冕山会合后，由彝族帶路分三路去消灭胡匪，向喜德結尾沟（甘相營）出发，这时匪軍已被彝族人民团团色围，逼得水洩不通。解放軍到了以后，先宣传俘虏政策，只打了一仗，匪軍就被迫投降。当天投降的匪軍有好几十人，有七个軍长作了俘虏。当甘相營的匪軍被残灭时，匪軍祝师长帶領的一个營两个连、匪軍邱团长帶領的一營警备队到红毛妈姑，彝族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消灭匪軍。剩下的残匪向西昌逃跑，到西昌就被解放軍消灭。西昌及其附近各县都解放了，上千的彝族人民赶到西昌来欢迎解放軍（他们叫“紅軍”）。西昌、德昌、盐边、盐源、金矿、冕宁、喜德等地，都有彝族群众远道赶来，牵了几十头牛来送给解放軍。

（以上材料，系1959年1月13日西专民委主任罗志清提供，民族調查組錢安靖整理）

米

米

过去，西昌专区一带，除普雄而外，都是地方軍閥邓秀廷的势力范围。地下党的力量在这一带也比较强。当时地下党曾经考虑过领导这一带彝汉人民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但是軍閥邓秀廷和彝族奴隶主对彝区的统治很严，要发动游击战争，非发动广大彝族人民不可。行以紅軍长征后的初期，工作开展较难。到了邓秀廷死后，他的儿子们统治西昌一带时，情况就有利了。因为邓秀廷的几个儿子爭权夺利发生冲突，如邓德华的儿子邓从浩和邓恒珊的儿子邓从华就经常爭矛盾。由于他们各统治一部分彝族，

于是就引起了彝族内部也时常发生大的矛盾冲突。1939年以后，党就利用这些矛盾冲突，大力在彝区开展工作。由于罗志清是“四十八甲”中有些威信的人，与黑彝奴隶主有矛盾，比较倾向于革命，因此，党就开展统战工作，使他靠近革命，搞好少数民族工作，从而发展革命力量。1946年后山乡的奴隶主率领一些彝人到石龙乡抢劫汉族人民，汉族群众起而反击，打伤一个彝人，于是伪靖边部就借此机会，打着“帮彝族报仇”的招牌，向群众进攻，纠合后山彝人准备打石龙桥。汉族群众也立即准备，起而自卫，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采取和解的方针。结果粉碎了军阀的阴谋，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党在彝族中的工作，并在少数民族（主要是彝族）中发展了党的组织。从此彝汉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就更加紧密了。1948年7、8月间，军阀邓文彬和邓德柱因争夺势力范围发生冲突，分别与奴隶主果基、保伍两家勾结，残害彝汉劳动人民。邓德柱与保伍家要放火烧石龙镇和泸沽。为了保护人民利益、打退军阀和奴隶主的进攻，党领导彝汉人民组织了两个支队：泸沽、松林、石龙的彝汉群众组成一个支队；复兴的群众组成一个支队。在广大群众的威力面前，反动军阀和奴隶主阶级不得不被迫退让。1949年2月，中央系军阀孙子文和地方系军阀邓德亮因争权夺利而发生武装冲突。因当时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党决定利用军阀矛盾，发展武装力量，派党员打入了地方军阀邓德亮军队中去。掌握了一营兵力，着手训练骨干，并采取一切办法箝制邓德亮，按党的指示办事，配合全国革命形势、解放西昌地区。由于地下党的革命活动震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因而他们立即派出伪警备部一个团和伪24军的两个团，企图捕杀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攻打党的力量较弱的石龙镇，并缓和与地方军阀邓德亮之间的矛盾。根据这种情况，党的指示是：快解放了，为了避免革命力量的损失，不宜打；另一方面，也要作好准备，如果敌人要捕杀革命人民、攻打石龙镇

时，就领导彝汉人民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时的部署是：石龙全乡的人民武装起来，调复兴乡的人民武装来支援，泸沽和后山乡的彝汉武装中途阻击敌人，松林的彝汉武装截断敌人的后路。共动员了两三万彝汉人民。由于全国革命的进逼和彝汉人民的动员，国民党反动派终于被迫撤军。由于党在冕宁地区大力组织和发动群众，领导彝汉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49年5、6月间，当伪警备部队到冕宁进行特务活动时，党发动了三千多彝汉人民（其中彝族十人以上）在10月1日集中冕宁进行了武装示威，并开了大会。会后，石龙和红毛区的彝汉群众又在当地分别开了示威大会。由于人民力量的壮大，伪警备部队被迫偷偷地逃回西昌，不敢再来冕宁了。总之，到1949年底，冕宁地下党已控制了公路沿线彝汉地区的基层政权和冕宁全县的财政粮食，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消灭残匪。

（1959年、1、14、廖志达同志提供，钱安庆整理）

*

*

1949年底，冕宁地下党已控制了冕宁沿安宁河与公路两旁彝汉乡镇的基层政权和群众武装（控制了半数以上的乡，掌握了三千多支枪，内中彝族有一千多支，动员了彝汉群众二、三万人），使驻在冕宁的伪警一连不但不敢下手，而且被我们监视起来。当时党又动员彝汉群众消灭企图逃窜的国民党匪军，并把辨别敌我军队的显明标志告诉了彝汉人民。当伪警备部队想从哈哈乡逃跑时，在党领导下的彝汉武装群众的威势面前，终于难逃人民巨掌，最后被迫缴械。1950年3月29日晚上，已是深更半夜了，冕宁大桥的几个彝族老乡气喘吁吁地跑进城来告诉伍文才同志：“今天晚上有几支军队到我们堡子来买草，开始我们躲着起来，以为是国民党的兵，准备想法抓他们。但是因为他们很讲道理，买草一定要给钱，又不惊动我们。我们立即想起了从前经过我们这里的红军，我们立刻舒起灯跑出去看，他们的帽上有五角星，我们

马上把草送去。”地下党早就派人去同解放军联系，始终没有消息，听他们一说，伍文才还是半信半疑，估计解放军可能来了。第二天一早，果然有一批解放军来到冕宁城，由50多个彝族群众和城里的汉族百姓欢迎进城。“红军回来了！”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接着就有城东的枧草乡、城西的哈哈乡和城北的棒木沟等地的彝族人民成百上千地来欢迎解放军。有的牵着牛，有的背着柴。解放军道谢他们，把牛羊退回，只收柴草，并照价付钱。彝族群众坚持不收，经过再三说服，他们才收下。第三天欢迎的人更多，各界各族人民在冕宁城正式开了庆祝解放的大会。伍文才代表少数民族在会上讲了话。会后，远近四乡的彝汉老乡都进城来欢迎解放军。遍于都堆满了柴草，到处有老乡赶着牛羊进城。解放军到冕宁几天以后，国民党残匪有一师人从康定经九龙、金矿，企图逃到西昌与胡匪会合。哈哈和阿普一带的彝族青壮年都争先恐后地为解放军带路、运送粮草，一直越过雅砻江，翻山越岭到九龙县，协助解放军歼灭这股流窜残匪。妇女们则随后把猪、牛、羊赶来慰劳解放军，她们说：“如果解放军再不要，我们把牲口打（打死）了，他们总要吃。”后经解放军再三解释、说服和劝阻，她们才把牲口赶回家。这样，彝族群众更受感动。当解放军回冕宁时，四面八方川流不息人群赶来欢迎，那天城里的柴草多得放不下了，连城外的山上都堆满了。

（1958年，冕宁县委记录伍文才同志提供，钱安靖整理）

※

※

关于泸沽一带地下党的情况，1949年3月以后的，我知道一些，因为我当时才参加地下党，同时由于情况复杂，我们都是直线联系，故所知情况也不很全面。

当时冕宁地下党是由王月生同志领导的。洪模、复兴、后山、石龙和泸沽等乡由邓明鸿同志负责，罗志清同志就是邓介绍入党的。

当时地下党的活动形式，主要是打入反动武装内部，借反动军队的名义，扩大我们的力量；抓住群众，扩大武装力量，以便配合解放军解放西南。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当地的一些封建组织如袍哥等，抓住首要人，争取群众，扩大我们的力量。

就我们记得的，当时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①借“孙邓事件”发展我们的力量。邓秀廷死后，孙子文同邓德亮为了争奇“司令”头衔，发生了矛盾，互相发展势力。我们借这一机会，一方面调解，一方面发展我们的力量。“事件”之后，党在后山乡成立了“政工处”，开办了训练班，由王月生同志负责并讲解哲学。这一期训练班还未结束，匪24早李开文带一团人来泸沽一带，为避免损失，就结束了训练班。

②借“二邓事件”发展我们的力量。邓文彬和邓德柱因收烟牧手夺利而发生冲突，我们从中调解，并争取和抓住邓文彬发展我们的力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利用邓文彬，从而发展了我们的工作。

③利用反动组织，打入敌人内部。胡匪来西昌后，组织了“反共救国军”，邓匪也组织了这种反动军队。我们也借此名义成立起一支革命部队。我们组成一个营，由邓明鸿同志任营长。下设五个连，洪模乡两个连，连长是肖伯通、柏其美；后山乡一个连，连长陆力兴；石龙乡一个连，连长廖志达；复兴乡一个连，连长肖在衡。这些连长都是地下党员，实际上这一营就是我们的部队，不过枪支由敌人供给罢了。那时我们已掌握三百多支枪，以后胡匪发枪，我们又得了八十多支步枪，四支机枪。

匪军组织反共军队，主要是想大家为他们卖命，一次，他们借口吴名要把我们拉往喜德。在石龙吴名后，匪军邓以镗要把我们拉走。我们提出“要自卫、不离县”，邓明鸿向匪军提出这个口号后，我们就将队伍拉了回来。

④反抗匪军抽壮丁的斗争。匪32补训处来这一带拉壮丁，

为首几个匪军来找林忠德，並敲榨索取酒肉，当即遭到我们反对。要把壮丁带走；我们也反对。他们人少见事不好就走。第四天带来百多匪军，来拉走壮丁，並要抢走枪支。地下党知道以后立即开会，当林忠德来开会刚走到泸沽桥时，正遇匪军带着壮丁过桥，匪军见林便说：“上次就是这家伙反对我们”，说着就将林同志捆起来，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停止会议，马上鸣砲集合，将匪军四面围住，匪军见势不对，为首一人马上同我们握手说：“有事好商量，不要伤了和气。”因当时我们仍打匪军番号，也就顺水推舟同他们谈判，结果将林同志放了，并处罚了两个捆林匪军的，将行拉壮丁完全留下，一个也不准带走。这样，匪军只得抱头逃走了，我们的力量也更加壮大了。

⑥我解放军快到这一带时，胡匪令一警卫连在新桥集中，准备逃跑。当匪警卫连组织到后山野二坟集中时，有彝族老乡2人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我们立即派军队和彝族人民把匪军一连全部消灭，彝族人民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

我一二野两支解放大军先后来到泸沽一带。一野由越西到冕山，二野由西昌来，即去甘相营追歼匪军。当时我们已与解放军接上头，为解放军准备了开水等欢迎他们。当时梁政委、林师长召集我们研究，並派邓鸣鸿去甘相营争取邓得亮投诚回西昌，以后邓匪即被动员来降。

⑦在地下活动期间，我们也准备过打土豪斗争，但没有真正干起来。只通过向富户借粮名义，征出不少粮食。匪军只向穷人征粮征款，而我们虽是匪军名义，但只向富户借粮借款。

在地下活动期间，对彝族地区的工作，主要是抓力量。当时彝族与国民党匪军关系恶劣，我们还没有以宣传民族政策为主；主要是抓力量、留退路。万一匪军向我们进攻，我们即可退入彝族地区坚持斗争。那时准备的退路有两条：一条是安宁河以西森荣乡瓦渣木基家一带；一条是安宁河以东后山乡罗志清家一带。

当时我们这一部份游击队还没有正式番号，听说旗子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地下工作同志当时都是身兼数职，如洪模乡相其美是连长、又当伪保长，这样就更好掩护我们的身份，更便于我们的工作。

(1959、1、16、泸沽供销社主任廖志言同志提供，姚立信整理。县委批：同意此材料)

2、会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白色恐怖又普及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阵地，党组织派龚成林同志于1942年由四川内地到会理来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主要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关系、培养发展对象，为将来发展作准备。

1948年，解放战争转入了全面大反攻，全国胜利形势已经基本确定，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上级党派马谏途同志到西昌地区进行传达，提出“放手发动组织，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迎接解放”的任务。西昌地区党组织接受这一任务后，积极地在农村和城镇开展工作。

会理方面，党在会理东部的金沙江和大桥、堵格一带高山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党组织、发展党员七、八十人。然后以农民党员为骨干、积极地建立了地下武装。

在开展汉族农民工作的同时，在彝族群众中也进行了工作，彝族人民二百多人，通过教育后，组织起来参加了革命。1949年6月彝族中的陆应举同志被批准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会东一带地区的革命武装，除了彝族二百多人以外，尚有汉族农民七百多人，组成了将近一千人的彝汉人民地下武装，共掌握了四百多支枪，称为金江支队一支队。

党同时会在理南部的树堡、绿水河、普隆、黎溪等地开展工

作，建立地下党组织和地下武装组织，彝汉人民参加武装的共约六百余人，称为金江支队二支队。

在1949年11月，会东和会南的革命武装，同时开展了公开的武装斗争。

在会东的金江一支队首先解除了大桥地区地主恶霸的武装。当时国民党匪军有一连人驻在金沙江边，目的在阻止云南游击队过河。金江一支队起义后住在其背后大山上，截断了他们与会理城匪军的联系。该连匪军因而企图化装逃走，假称“游击队”，分窜到彝汉人民家中，掳掠人民财物，人民怀疑的说：“这那象真正的游击队呀！”，因而上山向我军报告。同时，我游击队也已经探得这项消息，于是组织力量伏击于石口地区，经三、四个小时的战斗，打死了很多匪军，其余全部俘虏，并从战利品装备了自己。同时通过诉苦及其他种种方式对俘虏进行教育改造，又吸收和改编了地方上的一些小队伍，一支队增加到二百多人，乃向会理前进，准备解放会理城。

与此同时，会南的金江二支队也开始起义，首先解除了黎溪、树堡、绿树河等地的地方团队武装。国民党24军刘文辉部驻会理一个营，因刘文辉起义后与刘联系不上，处境非常困难，甚至找不到饭吃，金江二支队把他们吸收过来改编成游击队，武装力量增至1,200人左右。

一二支队原计划共同解放会理，在城内会师，二支队前进到距会理城30里的鹿厂时，遇上苏绍章等匪军，在鹿厂、凤山营、绿水河几次激战，双方均有损失，后胡匪宗南部顾介候率华南纵队败退到会理，匪势大增，我军因而撤过河去，驻在云南马干一带整训，并不时过江打击匪军。

金江一支队曾到达距会理城30里的罐罐窑，但没有与二支队联系上，后因匪势大增，撤至高山地区，在白香岩、嘎吉、乾海子、大桥、金沙江边一带与匪军战斗多次，因众寡悬殊，主动

撤到云南的会泽进行休整。

由于几次战斗有较大的牺牲，部份中途加入该队的人因而动摇了。撤过河时只剩下七、八百人，这是死剩的基本队伍，撤过河后开展了诉苦教育，战士觉悟得到提高，队伍逐渐巩固下来。

1950年3月中旬，解放西昌的战斗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的184师从成都南下，二野四兵团44师从昆明北进，对国民党残余匪军进行南北夹攻。金江支队的一二支队通过上级党委与四兵团接上头，配合解放了西昌。

44师分两路进军解放西昌地区。一路从滇北经武定，在元谋与金江支队二支队会师后，过金沙江解放了会理，金江二支队被留在会理接管了伪政府，二野部队继续北进解放了西昌。另一路取道滇东北，在会泽与金江支队一支队会师，由巧家渡金沙江经南宁到达西昌。一支队在西昌县约住半月，奉命移驻会理整训。金江一二支队除部份人参加地方工作外，其余合编为一个支队——金江支队，以后又改编成为一个营——独立营，最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每次战斗中，卢应举同志（彝族）都是身先士卒。他当时是大队长，率领二百多士兵。在乾海子战斗中，他的腿部受了伤，当时战斗十分紧张，他们坚持战斗，不下火线，并且不告诉别人，直到战斗结束。

1950年夏天，会理的地主恶霸发动武装叛乱，卢应举同志率领几十个同志支援工作队，在途中被土匪包围，经过两天的激战，其他同志都阵亡了，到最后只剩他一人，但他还是抖擞精神，力战群敌，亲自舒起机枪，英勇地坚持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象全队其他同志一样光荣地牺牲了。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1959年3月，西昌地委秘书长李逸同志提供，民族调查组陈汝聪整理，原稿李逸批改）

*

*

抗日战争后期，会理地区开始有了地下党的活动。当时，盘踞于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阀刘文辉部，就对李泸等人注意。1942年底，原在成都做过工运工作的龚成林同志，受反动派迫害不能立足，转至会理，领导这一带的地下革命斗争，任地下党委会理县委书记，同时，也是西昌地委委员。此后地下党员陆续来此。46——47年开始在会理发展党的组织。

解放战争后期，为积极配合解放事业，党在这一带积极准备力量，组织地下游击队。龚成林同志这时也打入了反动军队，立住了脚。同时，党又利用反动帮会，打入青帮，团结一批人，广泛展开统一战线工作，分化和瓦解反动军队反正。另一方面，在群众中积极积蓄和组织力量，在金江北岸普降、树堡等处训练干部，组织读书会等群众组织。49年春夏筹备伊始，秋末已就绪。当时组织起两个支队。其中一支发展到六、七个大队，发展相当普遍。二支发展到五个大队，其中农民大队四个，争取过来的刘文辉部一个营，组成第五大队。一支由李逸同志领导，二支由龚成林同志领导。定名为金江纵队。

党为了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了许多艰巨工作。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这一带各民族的子弟军。此地彝族、摆夷等族人民都参加了游击队。一支队有两个大队是以彝族为主，卢应举、彭润珂（均是彝族，卢为大黑夷）担任了大队长等领导工作。二支队的二、三大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员是彝族。以至解放后，整编下来，成为金江支队，力量更加充实，其中有不少民族干部（卢在金江支队任中队长，后于剿匪中牺牲）。另又争取会理西部的吉家土司，虽然他对革命尚在观望，但也和革命取得了联系。

当时党通过许多途径以分化争取反动军队反正，利用刘文辉和苏绍章之间的矛盾，争取刘部一个营反正，收编为二支队的五大队。对苏部手下的各大队也作了争取工作，当时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表示归顺革命的苏部反动军队即有四个大队。

金江纵队一支队由李逸同志领导在会东地区首先发动。打垮了苏绍章的部队，给反动派以很大创伤。二支队于刘文辉的一个营反正后，即于云南尤于正式发动。并且迅速推进到凤山营，被大地牵制了苏绍章的部队。只是这时胡宗南匪帮窜据西昌，派兵下会理。我早鉴于众寡不敌，为保存实力，一二支队先后退至金沙江南岸云南境内，与云南革命力量合并。

以后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野战军分别由云南、四川分三路解放会理、西昌。一由宁南、普格，一由会理，一由盐边。一二支队于会理会师，胜利完成解放会理一带的任务。

解放后，这支游击力量正式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江支队，力量大大充实。

(1960年7月13日会理政协李凤伍同志提供，民族调查组刘炎整理)

二、凉山和西昌地区彝族人民的解放和肃清残匪的问题

1. 关于凉山地区的解放和肃清残匪的问题

1949年是我军横扫残敌，实现全国基本解放的一年。1949年底，匪首胡宗南率领残匪大部逃窜西昌地区，企图负隅顽抗；另一部残匪伪69军在成都、新津、邛崃一带被我军击溃以后，只剩下二千余人，于50年初逃往芦山、汉源富林一带，招收新兵，与当地土匪羊仁安等勾结，进行改编约四千余人，企图作垂死挣扎。1950年3月，我解放大军神速进军，第一野战军由北而南，追击石棉、汉源富林一带的残匪，抵富林后，沿从前红军长征的路线，分别经冕宁、越嶲下西昌。第二野战军由南而北，从云南入川，横渡金沙江，追歼会理、宁南一带的残匪，直指西昌。

1949年蒋胡匪军溃退到西昌和凉山地区时，地方党组织即号召彝族人民为伟大祖国的解放事业立功。在冕宁地区组织了保

游击队，在会理地区组织了“金江支队”，直接配合解放军消灭敌人。同时又估计到敌人在我解放军和群众武装的致命打击下，必然向彝区逃窜，因此党又号召广大彝族群众，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企图窜入彝区的残匪。为了克服语言不通的困难，使广大彝族人民易于迅速识别敌我军队，以便及时、有力地支援解放军、彻底地消灭敌人，党向广大彝族人民说：“军帽上缀有五星的军队就是解放军，解放军就是从前的红军，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支援解放军歼灭敌人；凡军帽上没有五星的军队，就是逃窜彝区的国民党匪军，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他们，不让一个匪军漏网”。长期以来备受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的彝族人民，听到红军回来最后消灭国民党残匪的消息，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斗志高昂，随时都准备着欢迎和支援解放军、歼灭逃窜彝区的国民党残匪。这样，整个彝区就成了吞没国民党残匪的汪洋大海。

我军第二野战军由云南入川以后，在金江支队的支援和配合下，迅速解放了宁南、会理、西昌。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芦山、石棉、汉源、富林之后，在保游击队的支援和配合下，迅速解放冕宁、越嶲。在我两大野战军的包抄围歼的形势下，匪首胡宗南在我彝汉群众武装包围西昌机场的半桌钟以前，乘飞机逃跑，匪军走头无路。芦山、汉源、富林的匪军拼命南逃，往西昌逃窜，企图取得联系作最后挣扎。这两股匪军在喜德的甘相营相遇，决定逃窜彝区“安”身，逃脱覆灭的命运。于是一股匪军从喜德经西昌向昭觉逃窜，企图与盘据昭觉的27军军部会合；另一股匪军抄小道，企图分两路逃窜越嶲。

我两大野战军在广大彝汉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群众武装的配合下，跟踪追击企图逃窜彝区的蒋胡残匪。逃往昭觉的股匪大部分被我军追歼瓦解，只有一个营窜入昭觉县境，由于残军盘据在昭觉的国民党残匪进入昭觉时，为了稳定其占领地，曾杀害彝族四、五十人，彝族人民为了报仇雪恨，早想消灭盘据在昭觉的残匪，